

一首时代的颂歌

——歌曲《十唱共产党》的诞生

在全国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起1958年享誉全国歌坛的一首歌曲:《十唱共产党》。这首由我省著名作曲家航海编曲、洛川民谣作词,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负恩凤演唱的歌曲。由于歌词朴素真实、感情真挚,曲调优美动听,真实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一经演唱就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你听,“一唱共产党,好比那红太阳,祖国一片新气象,人人齐欢唱。二唱共产党,村村扫文盲,看书读报柳荫旁,水笔别胸膛。三唱共产党,绿化咱家乡,村前村后花果香,绿荫满山岗。四唱共产党,引水上山梁,山顶水磨哗哗响,高山水流长。五唱共产党,干部下了乡,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齐夸奖。六唱共产党,牧民心开花,千里草原好风光,羊肥马儿壮……”字字句句,从各个方面描绘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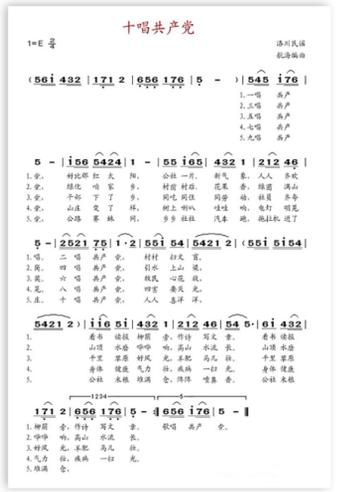
1958年,正是我国新民歌运动如火如荼的火红年代。亿万首新民歌如江河奔腾,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广大群众的胸中奔涌而出。当航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众多民歌民谣中,发现这首洛川民谣的时候,激动得彻夜难眠。他反复分析了这首歌词,认为它准确反映了时代心声,用典型的事实变化,抒发了对党的热爱和

对美好生活的赞颂。一定要写好它。他认为,既然反映的是农村生活,就必须以民歌形式来表现,既要易学易懂,又要易于流行和传唱。于是反复琢磨,决定把十段唱词合并为五段,以避免反复过多的过于呆板的问题。最初,他选用的是合水民歌《十想》的曲调。但反复吟唱后,感到不够理想,后两节的曲调和歌词的结合有些拖拉,便试用《绣荷包》的曲调进行编曲。虽然解决了拖拉的问题,但又觉得有些生硬不够自然,后又采用了《十杯酒》的基本旋律,又觉得有些低沉不够昂扬。经过多次反复推敲对比琢磨调整分析,还是觉得以《绣荷包》为基调较好,不仅词曲结合紧密,风格上也比较统一,旋律上也优美好流畅,也把群众的欢快喜悦之情准确表达出来。此歌写成后,他首先寄给了北京的《群众歌声》。一天,西安《群众音乐》的常曾刚主编来到航海家,航海拿出《十唱共产党》曲谱让他看,他一看就爱不释手,当即决定在他主编的《群众音乐》上发表。当得知此歌已寄给北京《群众歌声》时,他马上通过自己的关系,将歌曲要了回来,当期就发表了。

《十唱共产党》发表后,航海指名让著名歌唱家负恩凤演唱,因为,负恩凤是他引进歌舞剧院的,他对她的音色和演唱风格十分了解。当负恩凤首唱了这首歌曲,并

经陕西广播电台播放后,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好评。电台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数十封群众来信,要求学唱这首歌曲。电台立即满足了群众的要求,由负恩凤在台教唱了这首歌曲。不久,上海唱片公司邀请负恩凤为这首歌曲灌了唱片,在全国发行,一时间《十唱共产党》便广泛响彻在广大农村、工厂、军营和边防哨所,人们劳动时听着它、走路时听着它、学生课间休息时听着它……负恩凤也因这首歌的演唱而享誉歌坛。一些商家也抓住了这一商机,以影印的方式,把《十唱共产党》印制了亿万张唱片在各地广泛销售。陕西作家张从笑回忆他十二岁时,在家乡田野的喇叭上,听到这首歌,激动得忘了锄地,一些人问他:“这首歌是谁唱的?这么好听!”他竟然一时回答不出。直到1999年,他在一份《长安词林》的小报上,才看到了此歌的曲作者是航海先生,演唱者是大名鼎鼎的“百灵鸟歌手”负恩凤。

我省作曲家雷达先生说:“航海的《十唱共产党》旋律优美,通俗顺口,感情深厚,情与民通,简洁凝练规整有变,让人百听不厌。是他学习、运用民歌素材进行歌曲创作的成功典范。当我第一次听到它时,只觉其浑然一体,优美动听;继而玩味,便有点儿‘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再反复咏唱,就断定它是一首源自民间的‘巷里之曲’。后来才渐渐知道



它是源自妇孺皆知的流行于陕西、山西的《绣荷包》。让我才真正悟出了其中的美学原理。至此,这首歌曲潜藏的奥秘便昭然若揭了。真使我不由得赞叹航海先生的确是运用民歌进行歌曲创作的高手了。”

陕西音乐家关鹤岩、王焱、赵季平等,均认为航海是一位运用民歌素材作曲的高手。他总能将民歌与民情用淳朴自然的方式完美结合,创作出群众喜闻乐唱的天籁之音。航海说:“我最崇尚世界著名作曲家格林卡的一句名言,‘真正创造音乐的是人民,作曲家只不过把它们编成曲子而已。’” □杜书文

人物春秋

划龙舟救屈原是端午源头吗?

拉起禁绳,避免瘟疫的流入。但一旦瘟疫流入,人们就必须想方设法,尽早将瘟疫送走。为送走瘟疫,驱逐病魔,人们除饮用雄黄酒,用艾叶煮水沐浴及插戴菖蒲、艾蒿、石菖蒲、山丹花以及蒜头药用植物外,最常用的方式便是用巫术的手段送瘟神了。

送瘟神的方式很多,在水道纵横的江南水乡,以水路为主要通道的人们自然会想到用船载的方式将瘟神送走。具体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纸做成小船,将瘟神偶像放入纸船,点燃纸船上的蜡烛后,让小船顺流而下,纸船边走边烧,瘟神就这样被送走了。毛泽东主席在《七律·送瘟神》中所说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讲的就是这个传统;另一种方法是将瘟神放入小船,摆上粽子等供品,然后由人划船顺流而下将瘟神送走。如果是一家一户送

瘟神,自然也就不会再发生什么故事,但如果是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送瘟神,人们就会争先恐后,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自家或本村瘟神送走,于是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龙舟竞渡场景。后来,随着疫情的减弱和人们抵抗瘟疫方式的增加,五月端午划龙舟送瘟神的原始功能开始逐渐丧失,至少到了南宋,连赫赫有名的大文人也已经不知道人们为什么在这一天全民出动,划龙舟、挂艾蒿,只好以拯救屈原一解之之。

中国节日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节日都是从“恶日”发展而来的。例如除夕、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的产生都与恶日降临以及人们定期除恶的说法有关。古人认为,恶日的产生是“恶魔”作乱的结果。而利用仪式与“恶魔”斗法,则是古人最常使用的手段。这些仪式一旦被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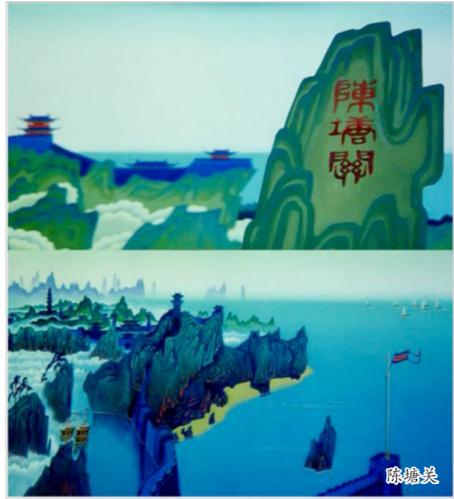
下来并形成规模,一个个以驱魔禳灾为主要功能的节日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端午节实际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此时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我国南方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后,随着社会动荡、南北融合的加剧,端午的逐恶仪式也因适应道教避邪禳灾的需要,而在道教的影响下迅速北上并影响到北方广大地区。但由于地域条件的限制,北上后的端午划龙舟仪式,由于缺少江河,不得不被北方的“旱鸭子”们割舍,而采用了他们常用的戴五毒香包、系五色缕、放风筝、走城、打石仗等方式,将他们心目中的瘟神早早送走。

尽管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端午节的真正起源已经变得十分朦胧,但通过插艾叶、饮雄黄酒、戴五色缕、穿五毒衣等端午仪式中所采用的传统避邪手段,我们仍能感触到历史上端午节的本来面目。

其实,追溯端午起源,真的与拯救屈原没有任何关系。 □苑利

《哪吒闹海》40年:千年东海陈塘关何处寻



龙神亦始于唐代。为了祈求龙王保佑,唐玄宗封四海龙王为神。神庙也一样,没有经过朝廷敕建,也是不允许建立和供奉的。否则,视作淫祠。自北宋以来,历朝历代官方供奉的东海龙王庙就在镇海。东海龙王庙的设立,则与镇海在我国海运史上的地位有关。镇海作为我国古代唯一一个大运河相通的不冻港,是东亚、东南亚各国来朝贡的第一站。盛唐以来,遣唐使摸索到了一条安全的航线,从甬江(宋元称定海江)口进入大运河。北宋起正式规定,中外使者必须由镇海进出。我国最早使高丽的官方实录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称:“自元丰(1078年)以后,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东海龙王庙在元丰元年十一月戊子日确定建立,以保佑中外使者和商人。文称:“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安焘言:‘东海之神已有王爵,独无庙貌,乞于明州定海、昌国两邑之闲建祠宇,往来商旅,听助营葺。’从之。”南宋宝庆《四明志》定海县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广德王祠,“东海助顺圣广德威济王庙,在县东北五里。皇朝元丰元年左谏议大夫安焘奏,奉使高丽还,十一月请建庙。勅封渊圣广德王……乾道诰书‘东海’二字于封爵之上。”根据惯例,皇帝每年春秋要派遣大臣来祭祀。

由于东海龙王庙在古定海县的缘故,宋元明三代“东海郡”成了宁波的专属别称,如元末明初诗人戴良《自定川入海》有“乍离东海郡,又上北溟船”之句;明代东海三司马,则是指三位曾担任兵部尚书或侍郎的宁波大文豪张时彻、范钦和屠大山;宁波产的知名中药艾草则被称为“海艾”。

明代的镇海,因是日本贡船登陆中国的唯一口岸,祭祀龙王的传统仍旧非常重视。在张时彻的嘉靖《宁波府志》中,镇海在原址附近保留了广德王庙,并在城南建龙王祠,都是祭祀东海龙王。

《哪吒闹海》动画片里,还有百姓为求雨用猪头等祭品供奉东海龙王的剧情。这一细节,说明导演作了专门的考证。当地人出海讨“开洋”,要办“开洋酒”,须用猪头等祭品供奉龙王。

古城和陈塘

陈塘关不远之处,有一条九曲河,是下东海的入海口。换句话说,陈塘关是位于河口的关城。镇海恰恰是我国古代唯一建在入海口的城池。唐大历六年(771年)镇海就有了建置,因为是遣唐使后期登陆的第一站,朝廷在鄞县甬江口海塘地设望海楼。望海镇东、南临江,北面临海。为防止海水侵蚀,唐乾宁四年(897年)已筑泥塘作为海堤。吴越天宝二年(909年),吴越王钱鏐建望海城,并置望海镇为望海县,寻改定海县。

唐乾宁四年的后海塘为土塘。根据南宋《后海塘记》的记载,当时的海塘以木固定,上招宝山修建至伏龙山,东西长数十里。土塘并不坚固,常被潮水冲溃导致灾害。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定海县令唐叔翰仿钱塘江海塘,改建石塘。这个古老的石塘,就是《封神演义》中的陈塘。

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时因抗倭所需,朝廷钦差信国公汤和到镇海出任总督备倭,谋划御倭事宜。汤和在原定海县城建定海卫,扩建定海县城,也即定海卫城。扩大后的县城,东起巾子山、沿唐代海塘、东南缘甬江、西连平川、北负大海,三面环濠河,周围九里有奇。城原有辟六门,北门是水门,直通大海。永乐十三年(1415年),浙江都指挥余成



因防潮水需要,又恐倭寇通过北门入侵,遂堵北门,只留镇远、南薰、清川、武宁、向辰五门。

汤和在扩城时,将城池北界扩至海塘。县城北城墙被直接修筑于海塘之上,形成了城塘合一的罕见现象。这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城塘合一的城池。我国城市一般是坐北朝南,北面的城墙便被称作后海塘。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在北城门旧址造望海楼,既可观赏沧海,又可警戒倭寇。后海塘因地理位置,屡遭海潮冲毁。隆庆三年(1569年)秋,淫雨飓风大作,海啸涌潮迫城,淹没房屋。浙江巡抚谷中虚于城北筑重垣以外护。万历二年(1574年),竣工。此后,滩涂的沉积使得潮水对海塘的冲击减小,后海塘至清代初年均未受损。

动画片中,我们见到陈塘关关城城墙之外便是大海。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围垦原因,镇海城北已成陆地。望海楼现今已经望不到大海。不过,历史影像资料给出了动画片类似的画面。

动画片中的陈塘关,导演凭想象,将一部分城墙建在山上。现实中的后海塘,东北角一段城墙确实是建在一座小山巾子山上。巾子山还与招宝山以海塘相连,为防止海水入侵和倭寇入侵,不留防护死角。再次感谢华生,他留下的巾子山照片,让我们见识到了山上建城的旧影。

定海关和总兵府

陈塘关,顾名思义是个边境上的关口。明代文人喜好把边境外国出入的要塞称为关,无论是有关隘或关城。镇海为明代最重要的海上关口,作为日本、琉球等国的登陆地,是诸藩贡道。于是,明人逐渐把镇海称之为定海关。比如,胡宗宪总编、郑若曾撰写的《筹海图编》就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敕首直款定海关要互市。总督胡公诱擒之。”浙直总兵卢镗也称镇海为“六国来王处,平倭第一关”。

总兵是《封神演义》里最常见的武官,除陈塘关总兵李靖外,还有三山关总兵邓九公、青龙关总兵张桂芳、潼关总兵陈桐、穿云关总兵陈梧、汜水关总兵韩荣等人。此设定源于

1927年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信,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试问,历史减少多少呢?”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者,优秀的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犹太民族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在智力方面却明显处于优势。犹太人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专业人才、学术巨匠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原因在于,在犹太人眼里学术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他们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在犹太社会里,学者和教师受到极大尊崇。与王公贵族、军政要员以及工商业者相比,犹太人始终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他们奉行这样一条格言:“为使女儿嫁给学者,或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没有比出一名或几名博士更为荣耀的事了。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被誉为“几何之父”,他是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有一次他正在教几何。有个弟子在做练习时突然问道:“我学这些能得到什么益处呢?”欧几里德听后大怒,立即吩咐身边的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得到好处的。”

1909年,王国维在京师图书馆做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有用无用之分。”不仅如此,他还说“学术是目的,不是手段。”

同样,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也一再强调一种纯学术的立场。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表明学术的“非功利性”。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学术)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合者”。这表明学术既要顺时而生又要异世而立,也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话都很好地说明了学术的真谛。

学术是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实用。所以,韩愈说:“勿诱于势利,勿望其速成。”同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若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而不带有任何功利企图,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种种新的发现。”晚清思想家魏源曾说:“学术之蔽乃散于利禄。”这话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学术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迎合、不媚俗,更不能简单功利。 □史飞翔

钩沉



宋宝庆《四明志》定(镇)海县境图

总兵镇守制度。明朝建立后,为防止蒙古再次南下,设置了九个边镇,各设总兵官镇守关城。嘉靖中后期,东南倭患爆发,明廷不得不在江南设立总兵官,总理浙直海防。嘉靖三十五年,因镇海是诸蕃贡道,浙直总兵定驻镇海城西南角。

明代的总兵是皇帝钦差地方的最高武官,地位崇高,权力极大,以超品的侯伯或二品以上的五军都督府都督出任。《封神演义》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提到:“且说李靖因东伯姜文焕为父报仇,调四十万人马,游戏关大战褒姒,荣不能取胜。李靖在野马岭操演三军,紧守关隘。”李靖如果手下没有足够人马,是不能与之抗衡的。现实中的浙直总兵也权力惊人。作为陈塘关总兵的原型,浙直总兵拥有调度沿海六省兵马之权。因此,当时尚是凡人的李靖会有资格跟龙王称兄道弟。

今亦有人言,明天津卫城是陈塘关原型。《封神演义》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此时的天津根本没有设立总兵,历史上也没有“天津关”的名词。东海、龙王庙、沿海关城、巡海等要素也与天津无法联系上。陈塘关的原型最有可能是定(镇)海城。明朝嘉靖以来,镇海不但是地方最高武官浙直总兵治所,也是地方最高的文官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的驻地之一,其名也远大于其他沿海诸城。明代其他小说也有定海城名的影子,《西游记》和《后西游记》也都提到了东海龙王及其宝藏“定海”神珍(“针”是讹字)铁,后者即是孙悟空手中大名鼎鼎的如意金箍棒。 □梁虹艳 徐春伟

往事